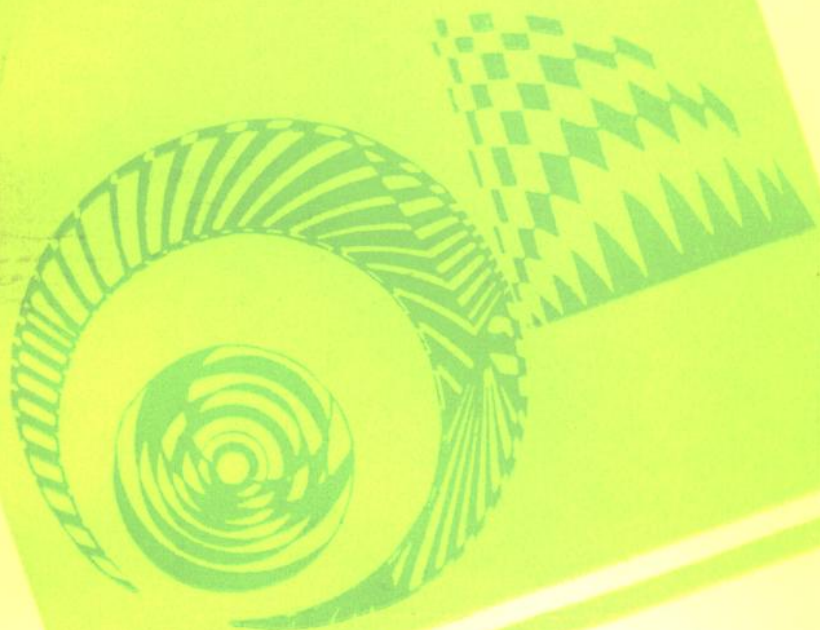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



# 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

朱红文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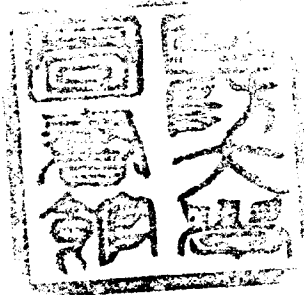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2 5322 1

# 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

## ——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

朱红文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 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朱红文著.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2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邢贲思主编)

ISBN 7-5035-0186-3

I. 人… II. 朱… III. 人文科学-方法论-概论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25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56 千字 印数：1 3000 册

定价：8.80 元

## 出版说明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在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选题论证、组稿和撰稿，第一批图书（4本）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邢贵思同志应邀任《丛书》编委会主编并作序，应邀参加编委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编委会共计15位同志。

这套《丛书》是我社组织的“八五”计划选题，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八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计划。为出好《丛书》，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编委会的同志和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工作百忙中参加研讨《丛书》编写方案，审定选题，并审稿会；认真撰写书稿，反复修改，为确保书稿质量费尽心血。在此，向《丛书》编委会的全体同志和作者对我社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针对当代哲学、科学和社会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前沿问题，在保证书稿质量的前提下，这套《丛书》将陆续组织出版。由于《丛书》所研究的是“理论前沿问题”，难免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探讨，这是属于理论争鸣问题，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丛书》编委会的日常工作，选题组织，落实作者等事宜，由我社张英杰和朱锐、吴可等同志负责实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11月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编  
编 委

邢贲思

(按姓氏笔划为序)

汝 信 邢贲思 沈 冲

肖 前 杨春贵 陈筠泉

张绪文 郑杭生 赵凤歧

姚介厚 耿 立 高 光

崔自铎 童天湘 黄楠森

## 序

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迎来 21 世纪。在这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无论是实践，还是哲学、科学方面都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研究哲学前沿问题，既包括研究哲学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也包括对实践和科学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给予哲学上的回答。

下面，分别就实践、哲学和科学中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作一简略说明。

20 世纪最后十多年的实践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使得西方的一些政客得意地断言：社会主义已经覆灭。现在，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已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东欧、苏联的蜕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才能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怎样才能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等等，却成了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又作了新的科学概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从本本出发，也不是从别国

的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当前，进一步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把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对这样的前沿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哲学自身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从最近国际哲学的潮流看，正在兴起一门“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1987年秋，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召开的世界非常哲学会议（The extraordinary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赋予这门学科以很重要的地位，会议专门设置了一个“心智哲学组”，以讨论这门学科的有关问题。心智哲学和心理学不同，不是一般地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而是探讨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中的哲学问题；它也不同于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认识论，它的研究范围要更加广泛，除认识领域外，还包括直觉、意志、意向性等所谓非理性心理结构方面，在层次上，它比认识论更为概括。不论我们对“心智哲学”这门学科怎样看，但它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它的某些成果应当借鉴。此外，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的发展，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解释学过分强调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不能通约，过分夸大主体的“理解”活动的意义，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它提出人文科学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还有，主体性问题虽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但近年来成了一个新热点。这是因为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又重新突出了主体性，而且着重从非理性主义的精神来加以阐发，使这一范畴似乎有了新的内容。尽管某些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在主体性问题上蒙上了一层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这不足取，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性

的内涵需要作某些扩展，对它的研究也需要有新的突破，这是不待言的。

需要研究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也相当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向传统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量子力学和非平衡力学所揭示的因果性，否定了拉卜拉斯的机械因果决定论，提出了几率因果性的概念，这不仅对物理学的研究有意义，而且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必然性、规律性的理论。但是，几率因果性的性质是什么，它和物质运动的关系怎样，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认为，在微观领域中，物质已经消灭，电子的本质就是几率波，几率波以及它的表现形式波函数和物质运动没有关系。爱因斯坦曾经嘲讽这种观点为“相信掷骰子的上帝”，很明显，这种观点背离了科学的真理。哲学的任务是，对物理学中提出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既不能无视物理学的新发展，又不能放弃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又如，关于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也是一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哲学问题。关于原子核内部无限可分性的哲学假设，近年来遭到了物理学的严重挑战。夸克禁闭、完域隐变量理论都提出了与此相左的例证。大爆炸宇宙学则从另一角度对无限性概念提出质疑。这种学说设想，宇宙的演化始于热大爆炸，大爆炸以后，宇宙的温度极高，相当于 $10^{27}k$ ，同时，宇宙迅速膨胀。这时的宇宙叫做爆胀宇宙(inflationary universe)。随着宇宙的扩大，温度下降，宇宙变成了“假真空”的特殊状态。“假真空”的密度极高，可能达到 $10^{77}$ 克/立方厘米。美国宇宙学家古斯认为，在宇宙爆胀过程中，“整个物质和整个能量能够从无产生”。这种学说是否正确，它的立论根据是否充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对传统的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哲学确实都是一种冲击。这既需要从天文学、天体物理学方面进行研究，也需要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自然科学中还有一个和哲学有紧密关系的问题，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



一个热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正面效应，科技发展造成的战争威胁、大气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终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危害；以美国赫德逊研究所为代表的学者则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远远超过了负面效应，同时科技的负面效应也终将由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克服。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学术机构设有“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课题组，目的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课题被列入“全球问题”的研究计划。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也较薄弱。1986年，在美国的威斯康辛举行了一次中美双边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会上，我国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颇受重视。但总的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比美国有较大差距。鉴于科学技术正继续向前迅猛发展，对这种发展的社会后果作出科学预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总之，哲学前沿问题的范围很广，涉及许多领域。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对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好处，而且也将有利于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各方面的专家支持下，计划出版一套《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拥护，并愿意为这套书的出版，略尽绵薄之力。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早日问世，并祝愿它的出版，将对我国的哲学研究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邢 贲 思

1992年11月

## 序

朱红文同志近几年来一直从事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除发表了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以外，还与人合写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他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又主译了史蒂文·卢克斯写的《个人主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和马克斯·韦伯写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两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在研究中，他发现，以往的社会科学观或社会科学方法论往往把人文科学囊括于自身之中，没有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别开来，因而存在着许多理论难题。所以在他入学不久，就比较早地确定了以人文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一书，就是他近一年来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众所周知，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发展；而发展就要求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文科学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近些年来“人类困境”的出现，也呼唤着人们重视人文精神；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这也就要求人们赋予经济发展以文化的价值。面对这一重大课题，我国学术界虽然有所认识，但至今还没有看到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红文的著作可以看做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人文科学方法论涉及的范围很广，需要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作者为此下了很大功夫，阅读和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个人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中去把握人文世界，揭

示人文科学的本质，建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作者指出，人所生活的世界并非纯粹的自然界，自然科学的规范不能涵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不能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也不能以社会科学来取代或否定人文科学。作者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把人文科学方法论同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区分开来，这对我国学术理论研究来说，应该看做是一个推动、一个进步。作者还根据自己的见解，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发展情况进行了评论，这些评论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可以从中领悟到发扬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科学方法论对于我国学术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我们国内又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因此，开展这方面研究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该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理论概括还比较薄弱，需要做进一步阐发；对有的问题的分析也不够准确，尚需进一步研究；与人文科学方法论有关的一些问题，尚待论述等等。尽管该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和缺点，但作者以宽阔的视野，揭示科学发展的时代特色，呼吁重视人文精神，发展人文科学，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齐 振 海

1994. 6. 25

## 前 言

本书的主题属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里的“人文科学”是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及其方法论特征这一问题，国内近年才有个别同志提出来，<sup>①</sup>但也并没有得到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这一课题在我国为什么长期没有人提出和研究呢？首先，是由一种错误的哲学观（实际上也是一种错误的科学观）造成的；其次，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有关。在我国的学术发展中，科学方法论往往被一般哲学或所谓“哲学原理”所取代。而一般哲学则用自己的“长官意志”或家长式的权威否定具体科学的独立、平等的地位；否定关于具体科学的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而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中，人文科学因唯心主义的嫌疑被逐出了科学的园地。

我们的哲学思维主要是一种实体思维，也是一种自然主义思维或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哲学与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因袭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共同本质与特殊本质、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一般方法（哲学方法）与具体方法（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错误观点；因袭了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盛行的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或科学观，把自然认识或自然科学中的因果性原则和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原则强加于一切科学，作为一切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公理。

这种实体思维方式和自然主义思维方式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实体还原论哲学（表现在认识论上则为理智主义、逻辑主义、基础主义）。海德格尔曾经把希腊哲学叫做“本体神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人们追求用“一”来说明“多”。作为一种逻辑方法，它

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现，是因果思维和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在哲学上，这种思维方法被极端化了、形而上学化了。人们追求用单一的“实体”、“本原”、“一般”来说明整个宇宙，包括人生。以为把握住了这个“实体”、这个“一般”就把握了万事万物的本质。长此以往，培养出一种思维定势，以为一般的、普遍的就是重要的、不可变易的、本质的，而把具体、特殊视作非本质的、次要的、偶然的、可有可无的、无意义的。这样，实际上否定了特殊性、具体性、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近代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都满足于捕捉一个虚无的实体、一个空灵的思辨世界，而不去关注现实的具体的人生，不去关注科学的人文前提，也不去探究因果分析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和界限以及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

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在西方理智主义文化中孕育出了西方科学这一骄子。但西方科学只能说是包括“一”与“多”这种因果理性方法在内的诸多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践的胜利，而不完全是实体还原论和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的成果。这种哲学如果说曾经为科学摆脱巫术、神话和宗教作过贡献的话，那么，在现代则已成为人类进一步开拓科学疆域的障碍。

这种实体还原论哲学不仅妨碍了人类对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理解，把因果分析当成了唯一的、不可移易的科学准则和模式，当成了人类探索真理、获取真理的唯一方式和途径；也妨碍了对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理解。往往把自己当作“科学之母”、“科学之科学”，当作科学的最高仲裁者，甚至当作真理的预言者，藐视一切具体科学。在这种哲学看来，永恒、唯一、终极的“实体”或“理念”是宇宙的“本原”、“本体”，是宇宙的“共相”和“本质”，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则只不过是如过眼烟云似的偶然的“现象”。它们只是宇宙的终极实体这一模塑世间万物的“原型”的一种“摹本”，一种“分有”。偶然的现象或

世间万物作为“殊相”，作为“共相”的“分有”，其性质并不比“共相”多，也不比“共相”少，就好象同质结构物中的一个组成要素，或者说，只是实体、理念的影子，正好象“月印万川”。既然如此，那么捕捉实体的哲学与研究现象的具体科学之间也是这种原型与影子的关系。哲学就是科学，科学也是哲学。宽容一点的说法是：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是哲学的下属；或者说，科学是在哲学指导下的关于具体规律的研究，而哲学是研究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样，具体科学就没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即使存在着，其结论也是“哲学公理”的一种演绎。既然哲学发现了一般规律，发现了本质，发现了真理，那么，具体科学家所要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哲学裁剪世界以后的边角余料进行缝缝补补而已。

海德格尔和杜威等人都曾认为西方文化过于理论化了，认为希腊人的“智慧”追求是人类的一大错误，这种智慧的意义是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当代西方哲学正在逐渐使自己摆脱自然科学的神化作用的概念，认为今天的哲学和文化必须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可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纷纷效尤西方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他们象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知道上帝会惩罚也要接受蛇的诱惑偷吃智慧的禁果一样，甘愿冒科学带来灾难的危险，也要去品尝科学的甘霖，正如胡适在为20年代科玄论战的结集《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言中说的，“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的确，西方科学在近代借助技术的进展和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但是，西方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却被西方世界以外的哲学家看作西方文化具有优越的“合理性”，在世界主要文明类型中西方科学文明成了占优势地位的文明类型，以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都被标示为“科学的时代”、“技术的时代”。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罗蒂尝试把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结合起来，他从分析哲学内

部来批判分析哲学，批判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传统。他指出：“这类看法的前提是，通过发现对物质的微观结构描述进行预测和控制的方法的发展，在某方面比（例如）风景画，政治改革或圣经经义注释，是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活动。或者再准确些说，所假定的是，存在有某种被称作‘理性’中心的人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发展是人类生存的要义——而且自然科学表明比任何其它人类活动更善于使用这种机能。”②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深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实体还原论哲学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压抑、限制甚至根本取消具体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我们以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了一般规律，把握了本质，那么具体科学、人文科学所要研究的特殊规律、所要把握的特殊性或偶然性就是不重要了，具体科学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了。

幸亏在西方科学氛围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或多或少的的影响下，人们并没有完全取消和否定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之内，我们因受恩格斯的教导和影响也还保留了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一些学科而没有耽心它们会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即使在这里，也曾经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而遭拒绝和批判。而在人文、历史和社会领域，我们更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终极的真理。甚至“社会学”也曾因害怕危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而遭禁绝。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等人文科学更有“唯心主义”的“重大嫌疑”甚至“反动倾向”而属禁绝之列。在勉强保留的“社会科学”概念中，也只保留了少数“根子正、苗子红”的学科，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过或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即使在这些学科中也只保留了一些教条化的内容，根本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应有的内容。因害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

而根本不敢与其接触；因害怕危及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根本不敢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患上了免疫力恐惧症，另一方面又装腔作势，变成了盲目的自大狂。这样，就把哲学当作一堆僵死的、可以象符咒那样到处贴用的教条，割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与具体科学的联系，使其失去了活生生的思想养料；另一方面也把具体科学家禁闭在教条主义的泥坑中。

这当然主要是发生在“十年浩劫”时期我国学术领域中的极其荒唐的现象。但是，作为一种“天翻地覆”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思潮，不管多么荒唐也一定有其根由。这样一种学术观念是实体还原论的哲学观念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关系的错误观点的彻底暴露和极端表现。

我们应该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个“最伟大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对关于人文、历史、社会现象的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但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把它与其它错误的、荒谬的理论和学说区别开来，是真理与谬误的划界，而不是学科的划界，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取代甚至否定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 and 科学性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的错误甚至荒谬的哲学学说的批判和辩论中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与同样有真理性 and 科学性的具体科学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比如，通过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比较，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是，我们却无法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哪门学科更有科学性，或更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科学是不矛盾的，相反，是相互作用、互为补益的。

谈到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联系，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即哲学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一门与具体科学相同意义上的学科？因为哲学从预言真理的神龛上走下来以后要么只能销声匿迹，要么就只有



做一个学科的“平民”而存在下去。理查·罗蒂从对传统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唯哲学主义的批判中，得出了一个无主导哲学的“后哲学文化”的概念。在罗蒂看来，在“后哲学文化”中，“某人对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自我认定，将只根据他所读过和讨论过的书籍，而非根据他想去解决的问题来完成。”<sup>③</sup>哲学系和哲学家也许仍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只是“饱读已往伟大哲学家典籍的教师”，只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传声筒”。也许“传声筒”都不如，因为未来的世界和未来的人们未必想再听这些“伟大哲学家”的声音，因此，未来的哲学家最多也是装载这些伟大哲学家的典籍的活书柜，不能再在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了。

西方传统文化的真正过错在于没有把哲学与具体科学、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康德探讨“纯粹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并不是象理查·罗蒂所理解的那样，是附和古希腊以来用哲学取代其他科学的做法，相反，是把哲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的可贵尝试。因此，康德接下来就开始追问“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时，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独立于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还应该指出，在人文、社会历史领域，康德仍然采用一种独断论的方式来发布“绝对命令”，而没有追问“纯粹社会科学如何可能？”“纯粹人文科学如何可能？”或者用他自己的论题和语言来说，“纯粹伦理学如何可能？”“纯粹美学如何可能？”因此，德国哲学在康德之后旋即又淹没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逻辑主义之中了。

哲学要是不满足于对抽象实体的思辨的话，而且当社会世界和人文（文化）世界从自然世界中独立出来以后，当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揭示出来以后，哲学再龟缩在这个思辨的象牙塔里也没有了那份神秘和威严，这时，它就应该走到具体科学中去，以新的形式重新肩负起对知识和科学批判的使命。但这时，不再是颁布知识和真理的“神谕”，而是对各部门科学的观念、方法、手段